

# 弹性治理: 全球治理的新议程

刘 慧

**提 要** | 近年来,“弹性”一词从生态与心理学界逐步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在当今充满风险又相互关联的世界上,弹性思维倡导正视危机与灾难、自我参照学习、稳健决策、适应与变革能力并存。弹性治理意味着对传统干预的抛弃,将承认失败、以社会与个人为导向的新治理方式逐渐提上议程,具体包括去中心化、能力发展、社会资本、大数据建设等。弹性战略已成为一种相当成功的行动方针。然而,弹性治理框架之下,人类可能不再具有自我选择的自由,只能适应外部环境,政治论为一个反应能力和伦理责任问题。这种危机面前的自我防护与新自由主义不谋而合,强化了既有的不平等权力机制。

**关键词** | 弹性治理 新自由主义 全球治理 去中心化

**中图分类号** | D58

**作者信息** | 刘慧,1978年生,南京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210023。

近年来,“弹性”(resilience)一词从生态与心理学界逐步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弹性是指行为体所具有的从负面冲击中恢复和保持正常功能的能力。弹性能力被引入全球治理以应对新出现的自然灾害、恐怖主义、劳动力市场改革、经济自由主义等全球热点问题,关注地方或社区在面对外生或内生冲击时的调整过程。2016年10月26日,美国白宫气候应对和恢复力委员会发布报告,从科学的信息/技术/工具、联邦机构使命和行动、社区弹性发展策略和伙伴关系三大主题出发,指导联邦机构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可持续、协调行动,以共同努力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弹性能力。<sup>①</sup>国际组织与学界也日益重视“失败”“否定”“弹性”等事实的概念化及其所体现的全球治理中的深层问题,倡导在面对自然灾害与政策干预失败时,用弹性思维应对复杂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从环境恶化到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

的解决,既有赖于政府间的协调与支持,更倚重于地方的能动性与弹性能力。

## 一、弹性治理的概念和内涵

众所周知,弹性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词汇。弹性在心理学、生态学、犯罪学、工程科学、人类资源研究、护理学、组织学、计算机科学和社会工作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sup>②</sup>国际关系的弹性研究议程借鉴了心理学和生态学领域的弹性内涵。心理学家试图识别个体从创伤、冲突、失败中恢复或进行自我调适的性

<sup>①</sup> 全球变化研究信息中心《美国发布〈提高国家气候变化恢复力的机遇〉报告》,http://www.globalchange.ac.cn/view.jsp?id=52cdc0665874e38d0158b410811e0024。[2016-11-30]

<sup>②</sup> Philippe Bourbeau, Resiliencism: Premises and Promises in Securitisation Research, *Resilience*, Vol. 1, No. 1, 2013, pp. 3-17.

格特征,揭示人们适应逆境的内外弹性机理。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探究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持续与变化、系统从动荡中恢复稳定的条件、遭遇外部冲击后的重组机会等。随着人类对于世界本质认识的加深,以及近年来国家治理失败案例的增多,失败和否定二词越来越成为弹性研究的焦点。2015年10月,英国《千禧年》(Millennium)期刊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办了一次专题讨论,旨在研究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恐怖袭击等恶性事件。此次会议从国际关系中出现的诸多失败案例出发,将失败与否定具体化和概念化,澄清其内涵和影响。会议成果分为两个领域:一个主题是关于政治与道德目的的局限性——由于决策者目标的失败导致对于最终预期的否定;<sup>①</sup>另一主题是关于认识论上存在的失败与否定。人们在解决问题时,往往存在一个先验(a priori)的世界观,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然而,实践中的反复失败促使我们反思自身的局限,通过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为人类在压力与冲击面前找到恰当的方法。

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弹性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一些学者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认识弹性,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彼得·霍尔(Peter Hall)和社会学教授米歇尔·拉蒙特(Michele Lamont)提出,社会弹性指一个特定组织、阶级、种族、社群或国家中的民众,在面对挑战时团结起来以增进自身福利的能力。国家虽不是社会弹性中的行为体,但为社会弹性的发展提供支持。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系教授乔纳森·约瑟夫(Jonathan Joseph)将弹性纳入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范畴之内,认为弹性治理的核心就在于灵活运用失败与否定这两个概念。关于失败具体有两层含义。首先,本体论上假定世界难以预测,充满不确定性;其次,在既有的自由主义干预框架下,机构和组织的干预、控制等行为往往也都是失败的。这种失败直接构成了否定的基础——在本体论上否定世界能够被控制,在认识论上否定世界能够被理解,否定国

际社会对重大问题进行干预的能力与义务。<sup>②</sup>

另一些学者以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杜菲尔德(Mark Duffield)为代表,认为西方社会对新自由主义的幻灭感是弹性议程兴起的动因。弹性是一种后现代技术,把突发情况纳入社会治理之中,关注个人的适应能力。威斯敏斯特大学民主研究中心教授大卫·钱德勒(David Chandler)指出,现代性思维认为失败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认识局限,而随着我们对偶然性和复杂性的认识逐步深入,失败被视为一种本体论必然性。这种转变包含了对失败从“排除”到“包含”的过程,即过去我们对于失败的态度总是消极的,失败被看成是例外或者意外,虽然不可避免,但总是被排除在规范之外闭口不谈,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会对现状产生威胁;而从21世纪开始,失败并不是偶发的,它深刻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部的相互抵触与矛盾。失败越来越被看做治理的一种手段而非障碍。灾难需要得到治理,而不是仅仅被束手无策的人类排除在外。换言之,失败是复杂反馈循环的本体论产物,系统性的互动无法提前预测,这就要求新型的思考和治理方式,超越现代主义线性因果关系的假设,解决非预期的、不可知的、无意识的影响。弹性治理议程需要将社会现实环境中的无意识反馈和非预期结果都纳入考虑之中,通过不断的适应与改进促使新的治理方式更加有效。弹性治理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的困境,在国际干预中,弹性体现了预防、赋权、负责任的施动性,而非自由主义的主权施动性(sovereign agency)。弹性并非新自由主义的变革,而是

<sup>①</sup> SH, AM, AAN, Failure and Denial in World Politic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4, Issue 3, 2016, pp. 303-304.

<sup>②</sup> Jonathan Joseph, Governing through Failure and Denial: The New Resilience Agenda,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4, Issue 3, 2016, pp. 1-21.

对它的扬弃。<sup>①</sup>

此外 德国埃尔福特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奥利弗·凯斯勒(Oliver Kessler)采用建构主义视角讨论“失败”一词。他认为,失败不仅仅是事情的结果,更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在此基础上,失败的概念分为三个方面:客观既定事实的错误呈现——人们无法确保自己构建的概念/理论与现实相符;主体间的误解——自我与他者之间无法产生相互理解与认同;未曾具备“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ies)的建构——的规范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和组织方式不存在(这种社会想象和组织方式包括合法性、个体、市场等概念的广泛共识)。<sup>②</sup>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伊莉莎贝塔·布里吉(Elisabetta Brighi)聚焦恐怖主义,探寻恐怖主义怨恨情绪的深层原因,并依此将失败划分为“公正的失败”(failure of justice)和“认同的失败”(failure of recognition)。正是由于公正和身份认同的失败,以及对这些失败的概不承认,导致了如今反全球化和恐怖主义浪潮的此起彼伏。<sup>③</sup>

上述研究表明,弹性是一个依托社会历史背景的动态的变化过程。现代主义的权力话语假定主体是理性的,否认权力运作失败的可能,失败只是意外,从而被视为“他者”。进入21世纪以来,失败逐渐成为创能型治理(enabling governance)的一个重要促动因素。例如200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每年的国际减轻自然灾害日改名为国际减轻灾害日(disaster day),简称“国际减灾日”,强调灾害应成为治理的对象,而不是将其排除在外。决策者不得不面对政策失败的可能。如何将失败纳入政策规划、变被动为主动,成为国际国内政策制定的重要关切。就国内来看,国家和政府无法完全调控系统,而是把责任转向个人和社区。就国际来看,大国和国际组织并不认为自身有能力和责任去应对发展、人道主义干预、灾难等问题,而是主张帮助弱国或落后地区提高其弹性能力。全球治理的目标从谋求系统控制的宏大工程转向能

够激发社会和人类潜力的适应性行为,体现了权力的分散化。在此意义上,弹性治理关注的是主体、社会和人类自身,为人类行为体的能力提升开启了某种可能性。弹性治理议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把弹性与全球治理联系起来,强调面对经济全球化时的弹性能力,如福利国家在面对新自由主义挑战时的弹性能力。由此,弹性等同于制度、社会规范的持久性。第二,将弹性用于国际发展、人道主义援助、减灾等分支领域。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将弹性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原则,这对于预防人类苦难、降低国际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极为重要。第三,弹性与反恐,为了在社区或地方层面做好预防,危机管理成为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要议程。英国把弹性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其基础就是应对恐怖主义的国内弹性能力的发展,加拿大、美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也都关注国内弹性能力的发展。

## 二、弹性治理思维的特征

在当今充满动荡又相互关联的世界,社会经济危机的传播速度像自然灾害一样快,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决策的快速、灵活性与自我学习能力。弹性思维关注的世界本质特征、人类认知、决策以及行为类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sup>①</sup> David Chandler, How the World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Failure: Big Data, Resilience and Emergent Causalit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4, Issue 3, 2016, pp. 391 - 410.

<sup>②</sup> Oliver Kessler, The Failure of Failure: On Constructivism, the Limits of Critique, and the Socio-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4, Issue 3, 2016, pp. 348 - 369.

<sup>③</sup> Elisabetta Brighi, The Globalisation of Resentment: Failure, Denial, and Violence in World Politic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4, Issue 3, 2016, pp. 411 - 432.

1. 正视危机与灾难。在弹性治理中,失败具有两层含义。首先 根据复杂性理论,世界的本质日益复杂且具有偶然性、流动性和混乱性,不存在稳定不变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形态。过去未曾预料到的事件甚至灾难时有发生、层出不穷,甚至并不意外的事情也会出现令人意外的结果。面对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人类能够做的非常有限。其次,在既有的自由主义干预框架下,国家、国际机构和组织对灾难进行干预、控制的行为往往会失败。<sup>①</sup>

危机或是灾难都是失败的表现形式,人类对其总是闻之色变。在现代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危机被认为是正常生活的例外产物,不应纳入考虑范围。然而,随着人类对于世界本质认识的深入,失败无法被隔离开来,风险与灾难是社会内生而成,需要用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危机。危机不再是令人厌倦的棘手事件,而是人们从中找到积极应对方法、缓解事态的有效治理资源。<sup>②</sup>通过对危机的承认与包容,人们积极适应调整、自我治理。所以,弹性思维要求对风险与灾难进行自我反思,从而达到自我拯救的目的,把反思得来的知识与信息再次用于指导实践,对以往行为方式作出合理调整。

2. 从改变外部世界到自我参照学习。以往的治理方法总是关注失败发生的原因,企图从源头消灭危机。然而,现实是人类生活彼此相连、相互影响。这种“影响的传递”(transmission of effects)让正确评估事件原因和结果变得极为困难。<sup>③</sup>因而,纠结于原因并无益处,接受事件后果、适应事态改变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自我参照学习过程是一个将结果运用于指导后续行动的过程。通过最大限度地接受有关结果的信息,达到最大限度地指导以后的进程,关注风险与灾难过后产生的影响。将关注点从因转移到果,并且通过分析结果来指导行为过程。任何一种治理方案的设计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通过反复调整,才能最终产生适应各国发展状况的规划。

3. 从最佳决策到稳健决策。人类的认

知范围与能力分为三个层次: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sup>④</sup>这体现了人类对于世界的不断探索和对自身能力不断反思的过程。传统预测建立在推因及果、由果到因的认知假设之上,集中于最先制定的政策目标,然后再以目标为导向指导实践。在21世纪,以弹性为导向的全球治理,需要摒弃这种目标导向的传统决策。“最优”(optimality)和“稳健性”(robustness)实际上是传统决策与弹性决策之间的显著不同之处。以目标为导向的决策总是先预测再行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优,追求充分发挥实效。然而当政策失效时,决策者往往手忙脚乱,难以招架,即使采取了补救措施,也经常由于时间紧迫、信息缺乏等原因最终失败。稳健决策是在高度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作出成功决策的行为。这种“成功”并不是指凡事做到最好,而是强调能够经受住变化与考验,之后仍旧发挥作用。稳健决策要求在数据过载、时间压力、高风险、目标模糊等情况下作出快速决策。<sup>⑤</sup>

4. 适应与变革能力并存。世界是一个无界的开放系统,根植于内部的危机与失败无法与人类的生活实践区分开来。在此情况

<sup>①</sup> Jonathan Joseph, *Governing through Failure and Denial: The New Resilience Agenda* 2016, pp. 1 - 21.

<sup>②</sup> Jessica Schmidt, *Intuitively Neoliberal? Towards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1, No. 2, 2014, pp. 402 - 426.

<sup>③</sup> Ibid.

<sup>④</sup> David Chandler, *Beyond Neoliberalism: Resilience, the New Art of Governing Complexity*, *Resilience*, Vol. 2, No. 1, 2014, pp. 47 - 63.

<sup>⑤</sup> Robert Patterson, Byron Pierce, Herbert H. Bell, Dee Andrews & Marc Winterbottom, *Training Robust Decision Making in Immersive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Cognitive Engineering and Decision Making*, Vol. 3, No. 4, 2009, pp. 331 - 361.

下,需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将视角转变为更为实用的维度——“永远需要适应”(always having to adapt)。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适应只处于次要地位;而在弹性治理思维之下,适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内容,学习与体验不需要外部的刺激推动就可以进行。生态弹性强调回归稳定状态,虽然经受干扰,但依旧保持体系内各部分原有关系;社会弹性将重点放在适应能力与变革能力之上。适应能力指社会生态系统面对不断变化的内外条件,学习、结合经验与知识并进行不断适应调整的能力。转变能力则是能够在保持整体完整性的情况下变革、创造新状态的能力。当我们认可弹性还包括进行变革的能力时,“有界封闭系统”就变成了“无界开放系统”。人类与干扰并没有界限,无法区分开来。所有干扰其实都是内生而成,在社会体系之中有着深刻的根源,此时适应能力与转变能力并存,是可持续存在的先决条件。<sup>①</sup>

### 三、弹性治理的实践意蕴

弹性治理意味着对传统干预的抛弃,将以社会群体与个人为导向的治理方式逐渐提上议程。这主要涉及通过责任下放实现去中心化,从制度建设转向能力发展,采用指导性方法,而非直接干预。同时,强化社会资本,发挥大数据在治理中的作用。

1. 去中心化。在应对灾难的国家干预中,制度能力与个体能力常常被认为是恢复和重建的重要前提。英国国际发展署认为,主体的适应能力取决于它们面对干扰和潜在危害时进行调整、利用机会并处理改变带来的后果的能力,包括主体对压力和冲击进行预测、计划、反应、学习的过程。这里的主体既包括个体、社群、地区,也包括政府、组织或机制。同时,主体的范围得到了扩充。有效地建立弹性,要求一系列主体间更紧密的联系:政府、公民社会、市政与地方当局、社会群体、私营部门、科学家和国家军事与民事保护主体。国际行为主体(如联合国国际减灾战

略、世界银行全球减灾与恢复项目)等也发挥重要作用。在既有的自由主义干预框架下,机构和组织试图进行干预、控制的行为往往都遭到失败,所以需要通过失败与否定来反思全球治理。通过否定宏观制度的有效性,弹性治理倡导远程管理(governing from a distance),其中蕴含了对中心化的、预期式计划的批评,强调面对危机与不确定性因素时的责任感、自我意识与自我调节。也就是说,增强面对失败的适应能力,重点在于个体能力发展,远程指导比亲自干预更为有效。<sup>②</sup>这种指导型措施以更为实用的方法取缔宏大规划,因而在具体应对时更加灵活。世界资源研究所明确提出了去中心化的任务:将权力转交给农村社区与个体,意味着将权力和资源下放到当地层次。这一过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自然资源治理的去中心化。在观念上,去中心化作为一种促进农村地区发展和增进平等的方法很早就被大多数政府所接受。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自主决策与当地资源自由支配者角色来加速去中心化进程。<sup>③</sup>

地方性管理旨在提高治理体系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匹配度。这类策略的假定是,我们没有必要调和一般意义上的制度互动中产生的冲突,实用的策略是就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从而避免或缓解多种体制在同一空间内运行时由于缺乏协调而产生的碎片化或不连贯

<sup>①</sup> Jessica Schmidt, *Intuitively Neoliberal? Towards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2014, pp. 402 - 426.

<sup>②</sup>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efining Disaster Resilience: A DFID Approach Paper*,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86874/defining-disaster-resilience-approach-paper.pdf](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86874/defining-disaster-resilience-approach-paper.pdf). [2017 - 04 - 18]

<sup>③</sup>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Roots of Resilience - Growing the Wealth of the Poor*, <http://documents.shihang.org/curated/zh/828121468338934887/pdf/482900PUB0wor110Box338893B01PUBLIC1.pdf>. [2017 - 04 - 20]

问题。<sup>①</sup> 这种权力的转移并非完全否定制度的作用,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宏观指导,不涉及具体的解决措施。在国内,表现为国家和政府将责任转移给个人和群体;在国际上,表现为国际组织帮助弱国和群体提高其弹性能力。<sup>②</sup> 国际制度可以为当地政府更好地进行规划提供知识保障,但弹性治理的视角应更多放在社会与个体层面,特别是当地的利益相关者。<sup>③</sup>

2. 能力发展。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确立以来,国际社会对于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发展的重视逐渐增强,在人类安全、国际干预、经济发展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研究。在弹性议程中,“能力发展”同样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能力发展”定义为个体、组织机构和社会获取、加强、维持与实现其长期发展目标的过程,<sup>④</sup>区别于“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更强调创造能力及其后续使用、管理与维系的过程。这一过程由内部驱动,建立在已有的国家能力之上。<sup>⑤</sup>

在能力发展中,传统的保护受害者语境已经没有意义,重点不在干预而在预防,不在保护而在授权,不在受害者而在脆弱性本身。弹性主体不能再被看做弱小被动的待拯救者,而应寻求主动的自我改变。<sup>⑥</sup>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展能力、增强应对灾难与危机的弹性。关注个体、公共部门机构、私营部门、民间组织和地方社群等利益相关者能力与素质的提高,发挥个人、体制和部门的策略性协同作用。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的任务主要在于帮助不发达国家建立自给自足的机构与制度,营造个体能够充分满足自身需求的环境。外部参与者只能发挥辅助支持作用,重点应扎根于一国本身的发展。例如,应对气候变化和石油峰值危机,本土主义将是一个必然选择。全球化的交通往来依旧,但不会以像廉价石油时代那么便宜而又简单的方式进行,它将会被更加可持续的交通方式所取代,并将使用可再生燃料。尽可能缩短食

物的运输距离,开发更多的本地产品。本土化还可以为当地生活注入生机并强化归属感,提升本土创新能力。<sup>⑦</sup>

3. 强化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以及人们相互之间的互动和与环境互动时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规范。在弹性治理中,可以将“适应能力”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反映了人类经历、学习并采取新途径解决严重问题的经验。社会资本既表现在心理情感层面,也表现在行为实践层面。举例来说,一个相互间熟识且具有良好信任度的社区,一定比感情淡薄的社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在面对灾害与冲击时弹性更充分;同理,相比缺乏集体联络的群体,一个居民热衷于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的群体也是如此。社会资本可分为三种类型:结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跨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联系型社会资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sup>⑧</sup>结合型社会资本适用于在某些形式上具有相似性的社群网

① (美)奥兰·扬《直面环境挑战:治理的作用》,赵小凡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95页。

② Jonathan Joseph, *Governing through Failure and Denial: The New Resilience Agenda*, 2016 pp. 1-21.

③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Building Resilience to Recurrent Crisis USAID Policy and Program Guidance*, 2012, <http://reliefweb.int/report/world/building-resilience-recurrent-crisis-usaid-policy-and-program-guidance>. [2017-05-23]

④ OECD, *The Challenge of Capacity Development: Working towards Good Practice*, 2006, p. 44.

⑤ UNDP, *Capacity Development: Practice Note*, 2008, pp. 4-5.

⑥ David Chandler, *Resilience and Human Security: The Post-Interventionist Paradigm*, *Security Dialogue*, Vol. 43, Issue 3, 2012, pp. 213-229.

⑦ (澳)彼得·纽曼·蒂莫西·比特利、希瑟·博耶《弹性城市:应对石油紧缺与气候变化》,王量量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63-164页。

⑧ 同上。

络,最突出的例子是朋友或家人之间由于情感上亲近的联系产生的紧密群体。跨接型则适用于在年龄、社会经济地位、人种与种族或受教育水平等方面有显著区别的人们之间的网络。联系型社会资本更加宽泛,主要存在于权力结构与社会制度当中。<sup>①</sup>

在灾难预警的最初,结合型社会资本总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相互之间的特殊情感能够促使家人或朋友间互相积极营救、帮助。跨接型社会资本虽然不如前者及时,但能够提供一些前者无法拥有的资源与帮助。联系型社会资本由于需要通过机制作用,距离较远,往往具有不及时或不适应当地切实需求的缺陷。依照弹性治理进程来看,增强结合型与跨接型社会资本尤为重要,它们能够很好地增强个体或群体在面对风险时渡过难关的适应能力。结合型主要用于提供及时帮助,跨接型则主要用于获取后续重建能力。加强多种类社会资本建设,有利于弹性议程顺利开展,具体包括促进社区志愿活动和个体间交往并完善激励机制、增加公众活动场所(咖啡馆、书店、人民广场、图书馆、沙龙等)建设、定期举行社区集体会议等方式。<sup>②</sup>

4. 发挥大数据的作用。近年来,人类开始提倡取缔无谓的因果追溯,将大量的、实时的数据跟踪作为决策的可靠信息。这种数据密集型知识指导政策发展的方法已在国际关系领域,尤其在减灾、维和行动与弹性治理中广泛使用。<sup>③</sup>大数据包括全球人口不断创造出的大量数字数据的总和。数据产生和收集的速度快、频率高,导致当今社会数据泛滥——平均每年数据量增长40%。大数据的特征通常概括为“3V”(variety, volume, velocity),即“种类多”“总量大”“速率快”。另外,还可以用“价值”(value)来衡量大数据在发展中的潜力。<sup>④</sup>弹性治理中的大数据并不是集中化的数据技术开发与使用,而是从每个社区与个体中找寻信息来源,再通过共享为大众所广泛使用,其中众包(crowdsourcing)的

方式尤为普遍。大数据不是国际干预者获得预测性知识的工具,而是为当地群体行动提供指导信息。大数据的基本特性不仅在于它的信息数量基础庞大,还在于它是实时更新的。这里的“实时”,指信息能够在相对短且与目前事件尚有关联的时间内产生,同时拥有时间表来规划应对措施。如果恰当使用大数据,可以在提前预警、实时认知和实时反馈三方面提供决策帮助。<sup>⑤</sup>同时,大数据并不以工具性或因果关系相关的知识为目标,而在于揭示实时反馈回路,以灵活应对。大数据发挥重要作用的两大基石是实时性和反馈性。人类间相互关系变得越数据化、透明化,我们就越能理解与把握复杂的因果链,弹性治理也越有成效。<sup>⑥</sup>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给予了大数据应有的重视。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弹性政策指导》文件中明确提出目前发展援助的几项基本措施:进行集体问题分析与目标设定、强化与协调弹性战略规划、信息共享的方案设计、

<sup>①</sup> Robert L. Hawkins & Katherine Maurer, Bonding, Bridging and Linking: How Social Capital Operated in New Orleans following Hurricane Katrin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 40, No. 6, 2010, pp. 1777 - 1793.

<sup>②</sup> Daniel P. Aldrich & Michelle A. Meyer,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59 No. 2, 2015, pp. 254 - 269.

<sup>③</sup> David Chandler, A World without Causation: Big Data and the Coming of Age of Posthumanism,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Issue 3, 2015, pp. 833 - 851.

<sup>④</sup> United Nations Global Pulse, Big Data for Development: A Primer, 2013, <http://www.unglobalpulse.org/bigdataprimer>. [2017 - 05 - 23]

<sup>⑤</sup> Ibid.

<sup>⑥</sup> David Chandler, A World without Causation: Big Data and the Coming of Age of Posthumanism, pp. 833 - 851.

稳健学习。<sup>①</sup>其中,信息共享建立在大数据使用的前提之上。英国国际发展署认为,在国家和地区之间彼此分享经验、观点与创意,可以促进弹性治理过程,为弹性相关投资建立证据基础与业务案例,在国家和地区层次上将全球弹性网络建立起来。<sup>②</sup>近些年,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尽管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非常发达,但决策者得到有用信息并及时采取行动以保护弱势人群的速度却总是滞后于危机的出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9年的“联合国全球脉动”(United Nations Global Pulse)倡议旨在为各国提供实时数据分析,以便更准确地了解人类福祉状况,尤其是全球性危机的影响,利用这些数据建立社交媒体版的“气象观测站”,考察公共辩论的风向、识别经济趋势,并预测即将显现的问题,造福国际社会。世界银行开放数据的弹性倡议(OpenDRI),旨在实时监测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2011年,全球减灾与恢复基金(Global Facilit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and Recovery, GFDRR)将一些公开数据的成果整理为以弹性为目标的公开数据库(Open Data for Resilience Initiative, OpenDRI)并向世界银行管理范围内的地区和一些委托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利用公开数据作出更好的风险决策。<sup>③</sup>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Data-Pop联盟(Data-Pop Alliance)等也将目光转向大数据在弹性治理中的作用。

#### 四、结 语

弹性治理要求人类正视失败,并寻找自我发展的出路。通过失败与否定进行治理,是弹性治理议程里最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从中学会反思与适应,是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时的自救手段。然而,承认失败并不代表悲观,而是努力利用能够抓住的信息,在不断自我反思的基础上更好地“安身立命”。究其根本,为“崩溃”做准备并非消极的失败主义论断,而是明智与从容,它倡导的其实是一种态

度——“优雅地失败”(failing gracefully)。<sup>④</sup>弹性将“适应”视为一种过程本体。在这种意义上,弹性摒弃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即人类施动性存在于指向外部的决策制定过程。弹性取向阻断了新自由主义的线性因果关联,把结果作为重新界定施动性与变革的基础,由此产生了适应性的自我治理,施动能力来自个体所处外部环境的刺激。<sup>⑤</sup>如此一来,人的能动性消失不见了,后人类主义愈加凸显。在后人类世界,创造性和施动性并非人类所独享,而是存在于各种嵌入式关系之中,这里并无人与自然、主客体、文化与环境等二元划分,人类日益成为具有自反性的弹性主体。与现代主义当中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控制不同,后人类主义倡导另外一种形式的自由与解放,强调人与世界之间的嵌入式关系,人类需要适应复杂关联的全球化世界。总体来看,弹性思维的兴起是冷战结束的产物,表明左右翼政治分野的终结,<sup>⑥</sup>人类

<sup>①</sup>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Building Resilience to Recurrent Crisis USAID Policy and Program Guidance, 2012, <http://reliefweb.int/report/world/building-resilience-recurrent-crisis-usaid-policy-and-program-guidance>. [2017-05-23]

<sup>②</sup>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efining Disaster Resilience: A DFID Approach Paper, 201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86874/defining-disaster-resilience-approach-paper.pdf](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86874/defining-disaster-resilience-approach-paper.pdf). [2017-04-18]

<sup>③</sup> Global Facilit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and Recovery, Open Data for Resilience Initiative: Field Guide, 2014, <https://www.gfdr.org/open-data-resilience-initiative-field-guide-0>. [2017-05-28]

<sup>④</sup> Patrick Meier, How to Create Resilience through Big Data, 2013, <https://irevolutions.org/2013/01/11/disaster-resilience-2-0/>.

<sup>⑤</sup> Jessica Schmidt, Intuitively Neoliberal? Towards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2014 pp. 402-426.

<sup>⑥</sup>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1994, pp. 2-6.

关切、论争与利益并不代表政治世界的全部，后人类主义的政治扩展到了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复杂组合，主张宇宙的世界主义政治（cosmopolitics）和地球的政治生态学。<sup>①</sup>

由此可见，弹性治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弹性战略已成为一种相当成功的行动方针，如弹性地方共同体被视为战区减少针对平民暴力的最佳选择。但总体而言，弹性治理应该达到何种成果、治理成效的评估等问题仍需深入探讨。另一方面，弹性治理框架之下，人类可能不再具有自我选择的自由，只能适应外部环境。政治沦为一个反应能力和伦理责任问题，而无关乎自由。在后人类主义的嵌入式关系中，人类不再有社会抗争和社会理解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有意识控制，而是迷失在不可知的重叠关联过程之中。这种对与外部世界关联的偏重，使人类无法作为

一个主体来行动，世界变得更加陌生，从而否认了人类的中心地位，忽视了世界的意义。<sup>②</sup>同时，国家把预防外部冲击的重负转嫁给个人，导致国家的缺位和失职。通过强调预防、自我意识、积极公民身份、责任，弹性有助于强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弹性倡导积极的公民身份观念，人们对自身的社会和经济福利自我担责，而不是依赖国家，国家由此在危机面前彻底隐退。<sup>③</sup>在此意义上，需要区分弹性方案中的强势方和弱势方，前者有能力和能力确保自身免于危险，而后者只能接受自身的脆弱性，自我负责，不能求助于社会。这种危机面前的自我防护，与新自由主义不谋而合，强化了既有的不平等权力机制。

（责任编辑：张莉）

※

※

※

① Isabelle Stengers, *Cosmopolitics 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② David Chandler, *Resilience: The Governance of Complexity*, Routledge, 2014, pp. 181 – 198.

③ Philippe Bourbeau, Resilienc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emises, Debates, Agend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7, 2015, pp. 374 – 395.